

经典作家之姚雪垠篇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还在衡阳做水利技术员,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立刻就被这部书所吸引,不仅仅因为那是“文革”书荒的特殊年代,的确是《李自成》不同凡响。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是入迷地置身于姚老所构筑的历史星空中,甚至引发出对晚明历史上的喜爱。我那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写一篇大文章来说一说这部书。但终因文学理论修养的欠缺和晚明史学问的疏浅而不能实现。

过两年,我到武汉去看望多年失去联系的兄长,兴致勃勃地跟他谈起《李自成》。他对这部书的喜爱程度一点也不逊于我。令我意外的是,他竟然与姚老是忘年交。他说:“姚老现在搬到北京去住了,不然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拜见姚老,当然是我所期待的。不过,当时即使姚老住在武汉,我也会有点忧虑,因为姚老在我心目中太高高了,我会有点怯意。正是这方面的的原因,加之我生性拘谨,后来尽管很多次地去过北京,却没有敢见姚老的念头,遂造成终生的遗憾。兄长说罢,还拿出近期写给姚老的四首诗给我看。这四首诗写得很好,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我愿借此机会,将它介绍给各位朋友,诗是这样写的——

历史的车轮走过20余载,再回过头来读《李自成》。我们依然能为其中的人物命运沉浮而心怀激荡,为人物情感波折而感怀万千。是什么如此牵动着我们的思绪,感动着我们的心?在《李自成》的评价历史里,阶级斗争话语是评价《李自成》的主线,由阶级二元对立建立的刻板印象,让《李自成》往往成为人性简单化的批判品。然而,当我们抛开笼罩其上的阶级外衣,深入文本内里,便会发现这部作品中内蕴着如此丰富复杂的人性书写。

1929年9月,《河南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两个孤坟》的短篇小说,这是姚雪垠的处女作。小说讲述了姚寨寨主欺压、虐待手下两个长工致死的故事,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原地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的社会现实。在创作之初,姚雪垠就显示了强烈的人性关怀,从《强儿》《碉堡风波》《野祭》等到《李自成》,这种人性关怀一直贯彻他的创作始终,成为最打动读者的地方。

从1966年到1976年,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将一切优秀作家、作品打落殆尽之时,《李自成》却两次受到毛泽东的保护,从而奇迹般地得以保存,且被允许继续创作,原因不仅有政治因素的考虑,更是作品本身的魅力使然。早在1971年,毛泽东就已经关注到了文艺界百花凋零的景象,并对此深表担心。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专门就文艺问题发表谈话,要求“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尽管《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并没有任何宣传与评论,但仍然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印数多达百万部。在同时期作品中,《李自成》所描绘的“浩繁而又精密的画卷”,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以其高超的艺术成就征服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更是小说从1977年到1985年在“人的解放”思潮高扬下依旧保持了文学界最受人关注作品的重要原因。

走进《李自成》,它到底有哪些人性的书写吸引了我们呢?我们不妨以崇祯和李自成这两位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为对象来看看。

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崇祯这个人物。作为抵抗李自成农民大军的封建皇帝,崇祯在新中国历史研究中显然是一个与革命政权对立的反面人物典型。但是,姚雪垠并没有从阶级对立的角度简单地把崇祯作为极端恶的形象处理,而是细致全面地写出了他作为一个喜怒哀乐、悲欢忧愁。姚雪垠注意到,崇祯在明代后期的几位皇帝中,还算是有为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最终无法剿杀农民军,反遭覆灭呢?他自己的性格占了很重要的原因。通过一幕幕历史细节的还原,姚雪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刚愎自用、多疑易怒的崇祯:仅凭大学士刘宇亮一纸“激昂慷慨”的奏疏,他就头脑发热,立刻决定派刘宇亮代替具有丰富戎边作战经验的卢象升总督天下勤王兵马,丝毫不管刘宇亮只是个能与家僮击剑比武为乐的文臣;内阁阁臣的除授升迁名单,他不经考察,随意改动次序或在《缙绅》上任意找个比较顺眼的名字添加在名单上,“认为这样办就可以对臣工

《李自成》对我的创作启迪

□唐浩明

寄姚雪垠四首
其一:
风霜雨雪漫言之,
又见艳阳普照时。
天欲假之鸣厥盛,
凤凰飞上最高枝。
其二:
古今中外恣翱翔,
撷取精英织伟章。
未负平生辛苦意,
《红楼》今看家家藏。
其三:
浩荡风云出渭南,
倩谁巨笔作奇传。
而今四海喜无惑,
史诗长留天地间。
其四:
两载睽违意念频,
春风犹记语谆谆。
龙门此刻远千里,
何日风涛过孟津?

再过两年,我告别水利技术员生涯,一心一意专攻文史。我很想多读一些当代文学作品,但遗憾的是,从那以后,很少能看到与《李自成》比肩的长篇小说,至于阅读时那种喜不自禁的情感,似乎再没有发生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着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其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再次阅读《李自成》的前三卷。我想让自己的身心进入一种弥漫四周、可触可摸的历史氛围中去,在这样的氛围里来感悟历史的本色、历史的丰富,以及历史的启示等等。在写作过程中,我也会常常挑选其中的个别章节来阅读,借以活络心灵、滋润枯萎。对我的历史小说创作而言,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李自成》应是启迪最大的一部书。

首先是姚老对历史小说写作的严肃态度和他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对我的启迪。姚老对他笔下那段历史的涉猎之广、研究之深,令我叹为观止。他在给茅盾的信中写道:“我在写这部历史小说中,对历史研究看得较重,认为是创作的基础,也下过笨功夫,所以现在弄清了许多糊涂的历史问题,翻案只是弄清糊涂问题的一部分。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统一。首先要对历史深入研究和理解,然后才有艺术构思。”《李自成》就是坚持走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统一的

这条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感受到这部巨制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它绝对是在对历史怀着敬畏之心下的产物。

历史小说创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处置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哪些必须真实,那些可以虚构,虚构到什么程度,其间的分寸如何把握等等。作为一个对明末农民起义有一定了解,但对晚明史没有研究的读者来说,读《李自成》,我在感觉上是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真实可信。当然,我知道这是小说,必定有不少虚构,但觉察不出来,发现了不明显的破绽。我在没有任何障碍的状态中,被不知不觉地引入作者所创造的文学世界,而不是像读有的历史小说那样,因为看出是在做假,便拒之门外,或者虽进门,但终因不能忍受而中途退出。《李自成》能做到这一点,便是它的最大艺术成就。我后来读到姚老写给茅盾的信,知道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独到认识。他说:“写《李自成》与写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同,全书故事进程,主要人物的出现和消失,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需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的虚构部分,也要纳入特定历史时间和地点的框架之内。”姚老说得明白:主要人物、重要事件要真实。他又说:“先研究历史,做到处处心中有数,然后去组织小说细节,烘托人物,表现主题思想。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也就是既要深入研究,也要跳出历史。”所有以历史为观察对象的人,都应该是姚老所说的既要“深入历史”,更要“跳出历史”。历史学家的“跳出”,为的是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宏观态势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家的“跳出”,则是为了更好地组织细节,烘托人物。姚老说这就是虚构。因为有“深入”作为基础,这样的虚构则有可能达到“于史无证,于理必有”(茅盾对《李自成》的赞语)的艺术效果。

情节的设置,最能见一个作家才华的高低。历史小说的情节设置,因为面对的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以稽查的往昔,故而除开才华外,还关乎作者的学养,即对史料、对典章制度、对风土人情的掌握程度。姚老在这方面的本事,堪称海内一绝。《李自成》中的许多情节设置都非常高超,都可以拿出来做历史小说写作的范本。我常常在文章和讲课中引用《李自成》第二卷上册里,写阎王为营救牛金星而派刘体纯赴开封寻找宋献策一节。宋献策其实也在为救牛金星而奔波。这一节从宋献策过开封州桥写起。他在州桥上遇到皋台府的鲁老爷,抓住鲁请他为儿子批八字的机会,与之套近乎。接下来,写他仗义救外乡人,引出陕西口音,挑明他去大相国寺的目的。然后写大相国寺,又偶遇李信,点出他急切想利用李信的能力救牛金星的愿望,又写尾随两位游客之后,透露出牛案的严重性,最后在练武卖药人中与刘体纯接上了头。本可以就此向读者做一番露底的交待了,却又穿插一段见鼠斗为酒店掌柜卜妻妾争吵的趣事。宋刘相会的这个

故事,通过这一连串的情节展开着,真是个性世相,纷至沓来,写得如同春日杨柳摇曳多姿,又如风过碧池水波荡漾,仿佛有时光倒流,随着宋献策游览了一趟汴梁古都的市井街巷之感。非大手笔决不能至此!我常对这个情节与《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对照,觉得他们完全可以并驾齐驱,都是历史小说中难得的精彩之笔。

对我的历史小说创作启迪很大的,还有《李自成》的语言。书中那些只有在深厚文史修养熏陶下才可能具有的文字,令我十分珍爱。我从《李自成》一书中悟到,历史小说与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在语言表述上应有不同。历史小说的语言应该文白相杂、雅俗兼备,才较为得体。写上层,写土人,宜用较为文雅的语言。这符合作品中人物的身份,也可以营造出很好的历史氛围。

当然《李自成》的最大成就应是成功地塑造出一批文学人物,如李自成、李岩、红娘子、张献忠、宋献策、牛金星、崇祯帝、杨嗣昌、吴三桂、洪承畴等等。这些人物的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姚老的心血与才华凝聚的结果,对我创作上的启发主要有两点。一是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决不简单化、脸谱化,力求将人物置于历史时空与文化长河中去,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才会饱满、复杂、立体、真实。如崇祯帝这个亡国之君,在《李自成》中是一个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具有重大的文学意义。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像崇祯那样走出纸面的活生生的皇帝形象。即便如汤夫人这样一个着墨不多的人,在姚老的笔下也栩栩如生,令读者印象深刻。她以李府女主人的姿态,打开大门接待新娘子,将丈夫托付给这个即将随同丈夫反攻的江湖女子的那一节,真是写得太好了。还有一点是,姚老特别注意场景的渲染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这些方面一向为中国古典小说所忽视,而为西方小说之擅长。既充分吸取中国古典小说的长处把故事写好,又将西方文学的这些长处学习过来细腻地摹绘场景和人物,长篇小说便可以既好读又耐读,人物形象也便能更坚实地站立起来。《李自成》在这点上成就特别突出,故而这部书又好又快,不少章节可以反复诵读而不会使人厌倦。

我在读《李自成》的时候,常常会在心里想:历史小说应该这样写才是,这种写法就是历史小说的正宗。我在写作《曾国藩》《张之洞》等历史长篇的时候,也很自然地沿着姚老的路子走着。《曾国藩》和《张之洞》有幸能连获第一届、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正是评委们对我遵循由姚老所开创的历史小说正宗写法的认可。今年是姚老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子,我要借此对这位开启新时代历史小说先河的前辈表达由衷的敬意,也要借此感谢姚老对我的两次厚爱。愿姚老的事业后继者不断,愿姚老的子孙永庆绵绵。

穿透历史的人性光芒:
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

□詹 玲

‘示以不测’,以致于把早已病故的人都加以升任,造成一大笑话。陕西巡抚孙传庭指挥潼关南原大战,追剿得李自成仅余十八骑逃至商洛山中,崇祯却仅以继任巡抚误报的李自成在崤函山的消息,就不分是非,不问真假,对孙大加斥责。而当孙以自己的作战经验力辩李自成不会在崤函山时,崇祯竟大怒,责骂孙“当面欺哄君父”,并令侍卫将其拿下。孙传庭有功反受责,忧郁惊恐之下导致耳聋,此时崇祯却疑心他是欺骗。在派出的保定巡按核实孙确实耳聋后,崇祯不但不相信,反疑其二人“朋比为奸”,一并问罪入狱。该疑不疑,不该疑时胡乱猜疑,其刚愎自用与刻薄寡恩可见一斑。正是这样的个性人格,导致了崇祯王朝覆灭的悲剧命运。

一方面,姚雪垠从崇祯的性格出发,告诉我们要崇祯政权为什么没能延续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刻画崇祯这个人物时,他还注重从普通人的内心情感出发来揣摩崇祯的心理。与其为人君的刻薄寡情相比,他为人父、为人夫的情感就要深厚、诚挚得多。到承乾宫,与活泼、可爱的五皇子与美丽多才的田妃在一起,他尽情地享受了一番人伦之乐。当看到五皇子跌了一跤还咯咯地笑时,他哈哈大笑,把五皇子“抱在膝上,亲了一下他的红喷喷的胖脸颊”。一个疼爱孩子的父亲形象寥寥几笔,便呼之欲出。城破之际,崇祯决定身殉社稷。在将太子与永、定二王送出官之前,他突然发现三个儿子穿的王袍戴的王帽,立即叫人予以更换,体现了为父的细心与周到。他嫌宫女们更换衣服的速度太慢,亲自“用颤抖的双手替太子系衣带,一边系一边哽咽地嘱咐”太子,教他们要隐埋行踪,碰到什么年纪的人该怎样称呼,提醒他们出宫后要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此时的崇祯,已经不是君临天下的皇帝,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言语之间流露出的父爱,对儿子们的怜惜与生死别离之情真挚可感,催人泪下。同样,在与周后、田妃等妻妾相处时,崇祯为丈夫的温和一面也时有体现。看到田妃所使用的镜子上的一首七绝铭文,他觉得不十分吉利,指出后又怕田妃因此事而不快,笑着许诺“永远不会使卿自叹‘闲身’‘孤影’”,将与她“白发偕老”。尽管很快就因李国瑞的事而使崇祯忘掉了这一诺言,但在说出此话之时,崇祯是发自内心的,这既是皇帝对田妃的许诺,更是丈夫对妻子,男人对女人的

承诺。田妃死后,他“常常不思饮食,精神恍惚,在宫中对空自语,或者默默垂泪”,“每到静夜,他坐在御案前省阅文书,实在困倦,不免打盹,迷迷糊糊,仿佛看见田妃就在面前,走动时仍然像平日体态轻盈,似乎还听见她环佩丁冬。他猛然睁开眼睛,伤心四顾,只看见御案上烛影摇晃,盈盈柱子边宣灯昏黄,香炉中青烟袅袅,却不见田妃的影子消失何处”。情犹在,人已逝,只有梦里相会,牵手相拥,醒来却是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思念无可寄托的苦痛与惆怅,即便是贵为君王,刚毅过人,也是免不了的。正是这些柔情色彩的加入,使崇祯刚硬的君王形象变得温和,在他的宝座与威严背后,是普通人性的温情流露。崇祯的形象也因此而变得丰满、生动起来。

除了崇祯形象外,还值得大加赞赏的,当然是《李自成》中的最主要人物李自成了。新时期初期,不少人对《李自成》第一、二卷中的李自成形象有所诟病,称太现代化了,李自成太高大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姚雪垠的创作意图。姚雪垠解释过,他在第一、二卷中把李自成写得高是因为“李自成在最艰苦环境条件下进行斗争,他必须惨淡经营,百折不挠,爱惜百姓,谦躬下士,发挥各种优点,才能自存;能够自存,才能徐图发展。在这个阶段里,他的性格也有阴暗面,也有弱点,但被克制下去。如果他在艰难困苦时就暴露许多品质上的弱点,便不是李自成,便不是历史上杰出的农民革命英雄,而他的事业就不会发展那么快”。但是不够耐心的读者,没等到他后面的文本出来,就从当时的人性论出发,随意妄加批评。

从第三卷起,姚雪垠开始写队伍壮大后,李自成与下级士兵、老百姓的关系日渐疏远,骄傲、虚浮的思想有所滋生。例如,打下洛阳后,李自成第一次改变了进城方式,“要使洛阳人民看看‘奉天倡义’的王者”气概和他的军容;在人马迅速扩展到几十万后,李自成正式称“奉天倡义武大元帅”,下级军士与百姓想见他一面变得越来越困难,老兵王长顺为抢修黄河堤坝一事求见了他几回,都被挡在帐外,只好横下心冲进帐中向闯王陈述;李岩、宋献策等人的劝告也开始听不进去,变得有些独断;而到了四、五卷,这种独断发展为狭隘猜疑,终致最后失败的时候,一人向隅独行,被杀于九宫山。姚雪垠非常细致、耐心地刻画

打下了江山,又很快失去了江山,权力私欲的膨胀形成的猜忌、多疑性格可以说是以失败的重要原因。对皇位的渴求使他再也无暇顾及百姓生死,进京前在白云观停留时,零星下了些细雨,李自成心里十分高兴,方丈以为他是在为麦苗得雨,百姓生计有望而高兴,殊不知他盘算的却是宋献策推算的有微雨之时即可破城,夺取皇位一事,帝王之权对于李自成而言,已经大大超过了百姓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此后的失败,也是必然。

除权欲的描写外,后两卷中对李自成情感生活的加入,也更丰富了李自成的性格内容。进宫之后,在举止优雅、面容端庄的宫女们的侍奉下,李自成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欲,但与承乾宫“管家婆”王瑞芬的接触,仍使他“心旌摇荡,几乎不能自持”,看到费珍珑的美貌,更是“感到意外,甚至吃惊”,以至夜间躺在御榻上久久不能入睡。食色为人性之本然,李自成也不可能避免。作为一名男性,面对美丽而多才的女性,会动心动情也是理所当然。但李自成毕竟不同于普通男性,因此姚雪垠又让他一再地提醒自己,要做一位贤明的君主,不可贪恋美色,用理智压制住常人的情欲。在询问过牛金星召幸妃嫔有无程序后,李自成方才处理了选妃之事,“召幸”了窦美仪。而窦美仪出众的才貌,赢得了李自成狂热的喜爱,使他再也不以压制普通的男男女之情,“几乎使他改变了多年来黎明即起的习惯”。对李自成的个人情爱描写,让读者感到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张挂着“英雄”脸谱的皮。

其实,不止崇祯和李自成,《李自成》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立体而丰满的,如满清皇族里足智多谋又阴狠有加的多尔衮,多情聪明、美丽端庄的小博尔济吉特氏,以及他们之间笼罩着权力与人伦阴影的情爱故事,农民军中直爽豪情却不乏残忍的张献忠、猴精一样狡猾的罗汝才,还有后宫里聪慧伶俐的田妃、温和敦厚的袁妃、端方稳重的周皇后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使我们看《李自成》,就会有明末清初战争动乱年代的生活图景真实、生动地再现于眼前的感觉。作为一部贯穿了姚雪垠生命40年的史诗性巨著,可以说,《李自成》已经与姚雪垠物我交融。在创作过程中,他数度写到痛哭流涕,情难自禁,正是生命完全浸透其中的体现啊!一个始终对人、对生命有着强烈人文关怀意识的作家,他笔下的人和事,必定也是充满人情人性的,这正是《李自成》跨越整个复杂多变的当代中国历史,依然能在当下光芒不减的原因。细数《李自成》之后的长篇历史小说,哪一部没有吸收过《李自成》的营养?哪一位作家没有受到姚雪垠的影响?能够在政治风云万变的时代守住文学最宝贵的东西,细致入微地把握人性这一复杂的幽微世界,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其价值可想而知。